

目 录

建国四十年来河南商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杨育彬(1)
四十年来河南商代考古的成就	陈 旭(10)
十年来河南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安金槐(17)
近十年来河南两周考古的新收获	胡永庆 宋国定(22)
八十年代河南夏商考古的新发现	林 木(33)
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而作	安金槐(38)
关于夏商史研究——《夏商史论集》序言	徐中舒(44)
探索夏文化的回顾与展望	李先登(48)
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邹 衡(52)
夏文化探索	田昌五(57)
有关夏文化探索的几个问题	殷玮璋(65)
夏文化初论	吴汝祚(72)
建国以来的夏文化探索	郑杰祥(79)
夏代和夏文化问题	佟柱臣(85)
夏代文化的再探索	许顺湛(93)
夏文化探索评议	宋豫秦(99)
关于夏文化源的探索——由古本《竹书纪年》夏代“西河”地望谈起	史道祥(103)
关于夏文化问题的一点认识	陈 旭(108)
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	郑 光(113)
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	佟柱臣(119)
关于二里头文化	孙 华(124)
二里头文化探讨	殷玮璋(129)
二里头文化再探讨	殷玮璋(133)
初论二里头宫室的复原问题——兼论“夏后氏世室”形制	(137)
二里头类型早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及其来源	隋裕仁(143)
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来源及相关问题	李德方(149)
二里头文化试析	杨宝成(155)
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	李伯谦(159)
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和年代	郑 光(165)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	郑杰祥(172)
河南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几个问题	袁广阔(174)

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	方 辉(181)
从王湾类型、二里头文化与陶寺类型的关系试论夏文化 ·····	何建安(188)
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	佟柱臣(199)
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	李学勤(210)
二里头早期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杜金鹏(212)
考古学上的一颗明珠——二里头遗址·····	郑 光(214)
二里头考古探索夏文化的回顾与展望——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的发言·····	赵芝荃(215)
关于先商文化诸类型的相应年代·····	李维明(219)
试论豫东地区夏商时代的文化性质·····	宋豫秦(223)
试谈夏文化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问题·····	孟凡人(227)
试论稍柴下层遗存的文化性质·····	林秀贞(235)
登封王城岗夏文化城址出土的部分石质生产工具试析·····	李京华(240)
试论豫东地区夏商时代的文化性质·····	宋豫秦(246)
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	邹 衡(247)
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	杜正胜(272)
“夏代阳城”探索记·····	安金槐(284)
夏王朝建都洛阳初探·····	方新庆(288)
中国早期都城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吕 静(294)
对河南境内夏商城址的初步探讨·····	安金槐(297)
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寻·····	方酉生(302)
有易、河伯地望考 ·····	戴济民(311)
试论郑州商代城址—— 敝都·····	安金槐(313)
“敝都”质疑·····	刘启益(322)
关于郑州“商城”的几个问题·····	安志敏(325)
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	邹 衡(327)
“郑亳说”商榷·····	石 加(330)
再论“郑亳说”—— 兼答石加先生·····	邹 衡(334)
“郑亳说”再商榷·····	石 加(339)
郑州商代王都的兴与废·····	陈 旭(344)
郑州商城即汤都亳新析·····	裴明相(350)
再论郑州商代城址—— 敝都·····	安金槐(358)
汤都四迁刍议·····	张维华(364)
偃师西亳说的困境·····	许顺湛(372)
敝都说与郑亳说的对峙·····	许顺湛(376)
关于郑州商城汤都亳的争议·····	陈 旭(381)
论商亳在郑州·····	闫铁城(389)
论郑州商城·····	田昌五 方 辉(395)
从古文字“亳”字探讨郑州商城问题·····	刘蕙孙(402)
试谈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并兼论夏文化的上限·····	赵芝荃 刘忠伏(405)
郑州商城宫殿基址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陈 旭(412)
关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年代问题·····	陈 旭(418)
我国最早的城址—— 郑州商城·····	陈显泗 戴可来(425)
商代敝都探寻·····	陈 旭(428)

内黄商都考略·····	邹 衡(433)
殷代后期都城——殷及殷墟·····	陈显泗(438)
汤阴朝歌镇发现龙山和商代等文化遗址·····	安金槐(441)
郑州故城址时代问题商榷·····	荆三林(442)
关于郑州商城的定名问题·····	郑杰祥(447)
再论郑州故城址的年代——答杨育彬同志·····	荆三林(452)
对《郑州故城址时代问题商榷》一文的商榷·····	杨育彬(457)
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杨育彬(463)
从近年的考古新发现谈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几个问题·····	杨育彬(472)
郑州商代遗址·····	河南省博物馆 郑州市博物馆(479)
近年来郑州商代遗址发掘收获·····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工作站(481)
郑州商城城墙结构及筑法探析·····	张锴生(489)
郑州商城考古又有新收获·····	宋国定(493)
郑州商代铸铜基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陈 旭(494)
西亳与桐宫考辨·····	邹 衡(501)
关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考古学年代及相关问题·····	张文军 张玉石 方燕明(527)
关于偃师商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	郑杰祥(542)
关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年代和性质·····	愚 勤(546)
关于偃师商城的几个问题·····	黄石林(551)
偃师商城年代可定论·····	董 琦(557)
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	徐殿魁 刘忠伏(559)
偃师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的建筑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陈 旭(561)
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	赵芝荃(566)
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	王学荣(573)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期文化·····	赵芝荃(582)
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关系·····	刘 绪(587)
二里冈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余 谷(593)
商文明窥探·····	马世之(599)
商王庙号考——甲骨断代学乙篇·····	陈梦家(606)
试论殷商源流·····	荆三林(628)
关于商族的起源——从《尧典》说起·····	李 氏(635)
郑州商文化渊源试析·····	陈 旭(642)
小议郑州南关外期商文化——兼评“南关外型”先商文化说·····	罗彬柯(647)
郑州南关外下层文化渊源及其相关问题·····	杜金鹏(652)
郑州二里冈下层与南关外中、下层文化遗存分析·····	李维明(658)
郑州二里冈期商文化的来源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李经汉(664)
先商文化与商丘的起源·····	孙 明(670)
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	刘 绪(674)
关于郑州商文化分期问题的讨论·····	陈 旭(698)
豫东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的关系·····	陈 旭(705)
关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及其他·····	仇 禎(710)
郑州商文化陶器编年增补·····	李维明(714)
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	郑振香(720)

殷墟·····	杨育彬(732)
殷墟发掘与殷商考古学·····	邹衡(735)
殷墟文化在世界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段震(738)
殷墟的年代及性质问题·····	杨锡璋(741)
殷墟发掘一处大型宫殿基址·····	王立早(749)
郑州发现商代前期宫殿遗址·····	宋国定 曾晓敏(751)
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郑州·····	郭振勇(752)
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	王玉哲(753)
盘庚迁都地望辨——盘庚迁都于偃师商城说质疑·····	孙华 赵清(756)
殷墟非殷都考·····	秦文生(760)
小屯并非殷都辨析·····	胡方恕(764)
关于盘庚迁殷后的都城问题·····	李民(768)
试论商王武丁·····	彭邦炯(774)
商王名号考·····	陈梦家(779)
殷代陶器·····	梁思永(遗作)(789)
谈谈郑州商代的几何印纹硬陶·····	安金槐(794)
试论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墟一期墓葬陶器及相关问题·····	郑若葵(798)
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	唐际根(803)
殷墟墓葬制度研究述略·····	商言(812)
殷墟南区墓葬发掘综述——兼谈几个相关的问题·····	孟宪武(819)
殷墟西区墓地分析·····	韩建业(824)
殷代墓葬形制·····	周永珍(834)
关于“殷人墓”的商榷·····	胡谦盈(838)
关于殷代俯身葬问题的一点意见·····	赵光贤(842)
我们对殷代俯身葬的看法·····	马得志 周永珍(844)
谈殷墟俯身葬·····	孟宪武(846)
安阳大司空村的殷墓是否全属晚期	
——对“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中殷代墓葬年代的商榷·····	吴汝祚(849)
安阳后冈圆形葬坑性质的讨论·····	赵佩馨(852)
安阳后冈圆形葬坑年代的商讨·····	刘克甫(854)
试论商代的车马葬·····	郑若葵(856)
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	杨锡璋(863)
殷墟考古发掘的又一重要新收获——小屯发现一座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	本刊记者(869)
殷墟发掘一商代贵族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877)
安阳殷墟中小墓中人骨的对应分析·····	黄其煦(878)
殷墟祭祀坑人骨种系多变量分析·····	韩康信 郑晓瑛(883)
小屯乙十一基址与 M238 的时代·····	彭裕商(888)
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	谷飞(893)
殷墟武官村大墓墓主试探·····	曹定云(895)
论殷墟侯家庄 1001 号墓墓主·····	曹定云(903)
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	李伯谦 郑杰祥(910)
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	杨锡璋 杨宝成(913)
对妇好之好与称谓之司的剖析·····	张亚初(919)

帚好略说·····	张政烺(924)
妇好略说补记·····	张政烺(928)
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	李学勤(930)
妇好墓及其相关的问题·····	陈志达(935)
“妇好”、“孝己”关系考证——从妇好墓“司母辛”铭文谈起·····	曹定云(938)
殷墟妇好墓铭文中人物关系综考·····	曹定云(947)
论妇好墓对殷墟文化和卜辞断代的意义·····	郑振香 陈志达(957)
妇好墓部分成套铜器铭文之探讨·····	郑振香 陈志达(964)
妇好墓出土司母辛铭文铜器的探讨·····	郑振香(971)
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从妇好墓器物铭文“戈自”谈起·····	曹定云(979)
妇好墓上“母辛宗”建筑复原·····	杨鸿勋(987)
妇好墓七件玉雕新解·····	尤仁德(992)
妇好墓出土象牙杯的现场保护和修复·····	郑文兰(998)
从妇好墓中的四件青铜酒器看商代工艺美术·····	张广立(1001)
妇好墓三种罕见的殷代青铜炊蒸器·····	陈志达(1004)
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年代·····	王宇信(1006)
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年代问题·····	李伯谦(1013)
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	(1018)
评《殷墟发掘报告》·····	魏 勤(1029)
记安阳殷墟早期的鸟类·····	侯连海(1032)

建国四十年来河南商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杨育彬

商代是我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又是古代灿烂青铜文化向高峰发展的阶段,也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步上升的历史时期。据《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从商汤建国到殷纣灭亡,共经历十七世三十王。相当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安阳殷墟是盘庚迁殷后273年的商代晚期都城,但对盘庚迁殷前的商代文化面貌,在解放前几乎是一无所知。建国后,由于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遗址和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的发现,郑州商代中期城址的发掘,安阳殷墟商代晚期考古的新收获,以及全省其他地方商代遗迹和遗物的出土,使人们对商文化全貌的认识为之耳目一新。

—

闻名中外的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县西偏南约8公里的洛河故道(在今洛河南)北。从1959年以来的多次考古发掘中,在偃师二里头有许多重要的发现^①。其中包括早商的宫殿遗址和一批房基、墓葬、窖穴、陶窑等遗迹,还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青铜器中有刀、凿、锥、鱼钩等生产工具,有戈、戚、钺等兵器,爵、铃等容器,还有圆牌铜器等。圆牌铜器的器边用61块长方形绿松石镶嵌,近似于钟表刻度形,中间镶嵌成两圈装饰,每圈均由13个十字形组成,制作十分精致。这不仅需要熟练的铸造工艺,也需要高超的镶嵌技术。铜爵中最大的一件通高22.5厘米,流尾长31厘米,底部呈椭圆形,窄长流,尖尾,流口间立二矮

柱,束腰平底,腹部的一面有两道宽1.2厘米的凸线,中间排列有5个乳钉装饰,造型别致,独具一格,当为商代早期的稀世珍宝^②。这反映了当时的青铜器已经脱离了原始阶段,完全能够制造出比较大型的和更为复杂的铜器来。由于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有铜渣、陶范和坩埚残片,说明这些铜器都是在当地制造的。玉器中有玉刀、玉璋、玉戈、玉钺、玉铲、玉柄形饰、玉版、玉琮、玉筒、玉玦等。玉刀呈梯形,上背长60.4厘米,下刃长65厘米,宽9.5厘米,刀上有7个圆孔,两侧有对称的锯齿形装饰,并有斜线划纹。玉璋柄和器身一侧各钻一圆孔,器身一侧的圆孔嵌有圆绿松石片。两面磨凹刃,两阑均出扉牙,最大的一件长54厘米,宽14.8厘米。玉戈长30.2厘米,援宽6.9厘米,双重内,内中部有一单面穿,双面刃,锋甚尖。玉柄形饰中最大的一件长17.1厘米,由粗节、中节、细节相互交错组成,外形似鞭,顶端雕成兽头形。这些玉器在艺术和制作方面都很精湛,尤其是玉戈,线条圆熟,抛光光洁,看不出雕琢痕迹,好像是模压出来的一样。北京玉器厂的老艺人们认为,它的制作水平跟现代差不多,代表了当时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且推断当时已有铜制的圆形旋转工具,否则不能加工出如此精细流利的花纹来^③。在陶器中除一般的生活用品外,还有陶埙和陶铃等乐器,陶青蛙和陶羊头等艺术品。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一件残陶器上饰有两条浅刻的龙蛇纹,一条龙巨眼、利爪、周身有鳞;一条蛇是一首双身,眼珠外凸,身上仰卧一只小兔;这一龙一蛇造型生动,且在眼眶内抹成翠绿色,浅刻线条内涂有红朱,颇为弥足珍贵^④。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宫殿遗址。1号宫殿整体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殿堂位于夯土台基的北部正中,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直径约0.4米的大型檐柱洞,南北两面各9个,东西两侧各4个。在每个檐柱洞外侧均还有两个小型擎檐柱洞,洞底都有柱础石。可以复原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四坡出檐式大型宫殿。殿堂前面是庭院。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有一组完整的廊庑建筑,南面和北面的廊庑,中间起墙,两边立柱,构成两面坡顶;西边及东面的廊庑,外面起墙,里面立柱,构成单面坡顶。夯土台基正南边缘的中间突出部分,有一排9个大柱洞,这是大门的遗存,可以复原为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由此可以看出,这里北部有雄伟高大的殿堂,中间为广阔平坦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南面是宽敞壮观的大门。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其平面安排,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在殿堂附近和庭院中,还发现一些灰坑中掷埋有人骨架,有的两手紧贴胯骨,左右上肢骨脱位,似遭捆绑。有的灰坑填土还经过夯打。这些很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祭祀坑。而这些人骨架就是祭祀时的牺牲。同时,在宫殿遗址内没有发现明显的居住生活的迹象,推测这里可能是王室的宗庙建筑^⑥。

2号宫殿也是一座大型夯土基址,西南距1号宫殿遗址约150米。南北长72.8米,东西宽约58米。四周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为复廊和大门,中间围成一个庭院,庭院北部为殿堂,殿堂与北墙之间有一座大墓。南部大门为庑式建筑,位于南侧正中稍偏东。东西长14.4米,南北宽10.7米。是一座由木骨墙围成的东西一排三间屋子及前后皆突出于左右复廊的廊子组成,东西两室略呈正方形,可能是文献上所记载的“塾”。中间屋子为一穿堂,屋子南北均有宽2.9米的缺口,为大门的门道,有路土延伸。庭院东部发现两处地下排水道,一处是在庭院东北部,是在沟槽内以若干节陶水管相连接而成,在东廊和东北门道下面穿过,水道西高东低,便于将庭院的水排出去。水道上面填土封存,以便行走。另一处在庭院东南部,也是先挖好沟槽,但槽内不是安装陶水管,而是用石板上下左右砌成方腔形水道,亦是内高外低,便于排水。殿堂是在整个宫殿夯土基址再加筑夯土台基而建成的,东西长32米多,南北宽12米多,

四边各有一排柱础槽,槽内有柱洞,洞下有石柱础。南北两排各10个,东西两排各4个。柱洞里侧约2米处,有一周长方形木骨墙,中间又有两道隔墙隔成三室。东西二室面阔均为7.7米,中间一室面阔8.1米。进深约5.6米。木骨皆靠墙里侧立着,墙槽底部放有方形横木以承木骨。殿堂的三室南面均开一门,中间隔墙也有门相通,室外为回廊建筑。殿堂北侧有一座长方竖穴土坑墓,墓口东西长5.35米,南北宽4.25米,墓深6.1米。墓内有生土二层台,填土全经夯筑。该墓中部有一个大盗洞直通墓室,墓内遗物被盗一空,只出有少量朱砂、漆皮、蚌饰片、涂朱陶龙头、一具装入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等。该墓规模与殷墟妇好墓相当,这是目前所见最大的一座商代早期墓。大墓与大门南北对应,其中线向南延伸,正好通过南面大门门道正中。由此推测,2号宫殿遗址也可能属宗庙之类的建筑^⑦。

1983年春,在偃师县城西偏南近1公里处,发现一座商代早期城址^⑧。城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河,中部有一条东西向的低洼地带穿城而过,当地群众世代相传称之为尸乡沟。由此,称该城为尸乡沟商城,整个城址均覆盖在现今地面之下1—4米不等。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700余米;东西宽度不等,最北部宽为1215米,中部宽1120米,南部宽740米。城周围有夯筑土城墙。西城墙北起大槐树村西南约100余米处的西北城角,向南穿过偃洛公路,再经塔庄村西,最南至洛河北堤边,长约1710米,宽约17—24米,高1.5—3米。北城墙西起西北城角,由大槐树村南向东,穿过偃师化肥厂,然后斜向东南至城的东北角,总长度为1240米,宽约16—19米,高2—3米。东城墙北起东北城角,沿氧气厂西侧向南约955米处,依地势折向西南,在塔庄村东北又折而南行,终于塔庄村东小路北约80米处,现存总长度为1640米。宽约18—20米,高1.5—2.5米。这三面城墙均为酱红色生土掺杂灰黄色地层土夯筑而成。夯层基本平直,每层厚8—13厘米。表面夯窝密集,为圆形、圆底,直径2—3厘米。夯窝排列无规律且多重叠现象,当为反复夯打所致。南城墙已被洛河冲毁,无迹可寻。

在尸乡沟商城已找到七座城门,其中北墙正中有一门,东墙和西墙各有三门。在北门处,探出路土宽约9米,厚约0.3米。西城墙的“西二”门已

发掘出来。门道全长约16.5米,宽2.4米,门道两侧各有一条东西向的窄墙,紧贴城墙两端,亦由夯土筑成,墙内保存有排列密集の木柱洞痕迹,柱洞底部埋有础石,门道下面是厚0.4—0.5米的路土。在城门内侧向南4米处,有一条与城墙垂直相交由夯土筑成的“马道”。长30米,宽3—4米。东端与城内东西向大道相连接,逐渐向西增高,直抵城墙,便于登城。此门经使用一段时间后废弃,两端用夯土短墙封堵,城门内侧附近渐成一片墓地。东城墙的“东二”门也已发掘,门道全长19.4米,门宽2.4—3米。门道两壁紧贴城墙的木骨泥墙内残留16个柱洞。在门道路土下深0.4米处,有一条地下排水沟,上盖木板,两壁以石块砌成石柱状,柱间夹立木柱,承托木盖板,沟底用石块叠砌成鱼鳞状,沟宽约1.2米,深1.3米,全长800多米,由宫城通到东城门外。

城内大路纵横,已发现东西向大路5条,南北向大路6条。路面宽6—10米,与城门方位基本对应。城内南半部筑有三座小城,宫城居中,平面近方形,四周围以厚3米的夯土墙,周长800余米。南墙正中是宫城大门,门前有一条大道直通城南。另外两座小城分别位于宫城的东北和西南,面积稍小,均为长方形,四周围墙亦厚约3米,内有排房建筑。可能是武库、粮仓或屯兵防卫的小城堡。宫城中部,有长、宽各数十米的大型宫殿基址,其左右两侧均有大型夯土基址。殿前大道两旁,也有面积较大的建筑基址。这突出了中间宫殿的主体结构,形成了相当壮观的大型建筑群。在宫城内东北部,发掘出4号宫殿基址^⑥。正殿居北,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6.5米,南北宽11.8米,建于夯土台基上,高出当时地面约0.4米。台基南侧有间距相等的四个夯土台阶。殿堂的东、西、南均有廊庑三面环绕,中间为宽阔的庭院,显示了商代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还发现有南大门和西侧门,以及两座水井和三处石砌的排水管道。在宫城西南部,发掘了5号宫殿基址^⑦。正殿居北,东西长约54米。南北宽约14.6米,在基址四边各有一排柱础石或柱子洞。殿堂东西两侧有北庑,西段长28米,东段长25米,南与正殿南边相齐,北边内收7.7米,亦发现有柱础石。西庑基址北端与北庑西端相连,东庑基址北端与北庑东端相接,均长约26.5米,宽约6米左右,也有柱础石。正殿北面发现有石筑排水沟,正殿南部边缘发现有一排8个埋有

小狗的土坑。东、西庑之间为庭院,其南部尚未勘察,情况不明。5号宫殿下层,还叠压着“回”字形殿基。外边缘南北长42米,东西宽38米,四面均为基址,中间构成南北长26米,东西宽25米的方形庭院。仅在东面基址中部发现有宽2米的门道,在院内有两口水井,很难看出原貌。

从上述考古发现,这座商城既非一般村落,也不是方国小城,而应是一代王都。结合文献记载考证,这里很可能是汤都西亳。《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条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又曰:“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史记·殷本纪》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偃师西亳,汤都也”。由上述看来,西亳是在偃师县西的尸乡一带,而且是汤从南亳迁到这里的。这些文献记载,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这里不但有一座商代城址,而且城内还有一条尸乡沟。此外,在商代城址西北的杏园村发掘的唐墓内,出有唐景龙三年(公元709年)的《唐故处士院西李君墓志铭并序》,墓志中记有:访旧瘞于北邙,祔新茔于西亳……葬于偃师县西十三里武陵原大茔”^⑧。还出有《唐故荥阳郑夫人墓志铭》,记有:“夫人终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八月八日,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亳邑乡”^⑨。说明唐代这里还叫西亳或亳邑乡,也绝非巧合。再者,这里是夏王朝的腹心地区,汤灭夏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为了加强控制迅速扩大的商代疆域,为了镇抚夏王朝残余统治势力,从南亳迁到这里建立新都。除前面文献记载之外,《诗·商颂·殷武》记有:“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春秋齐器《叔夷钟》铭:“虢成唐(汤),有严在帝所,尊受天命,剪伐夏祀,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为此提供了佐证。

综上所述,尸乡沟商城为汤都西亳,而其西约5公里的二里头宫殿基址,则可能是当时商王的宗庙建筑。这些考古发现,大大开阔了夏商考古的视野,为探索夏文化和研究早商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无论从哪个角度上去阐述,其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二

1950年秋,在郑州东南郊的二里岗,发现在商代的绳纹陶片和石器。1952年10月,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在这里进行考古实习;1953年,河南省的文物工作者配合基建又在这里发掘。这两次收获如此丰富和重要,不但先后写出了《1952年秋季郑州二里岗发掘记》的考古报告^⑧和《郑州二里岗》考古专刊^⑨,而且按照考古学上的惯例,把以后其他地方类似的考古发现,都命名为商代二里岗期文化。这是属于商代中期的文化,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较早的二里岗期下层和较晚的二里岗期上层。其后,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发掘,了解到这种商代文化遗存分布范围较广,东起凤凰台,西至西沙口,北自花园路,南到二里岗,面积达25平方公里。既发现有商代的房基、窖穴、壕沟、水井、墓葬和以狗为牺牲的祭祀坑等遗迹,也出土有青铜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习刻字骨和陶文符号等遗物。1955年秋,在白家庄配合基建发掘中,发现商代夯土城墙,经钻探得知,商代城墙由白家庄沿城东路西侧向南延伸,与郑州老城东城墙内的夯土相连;从白家庄西侧向西穿过紫荆山,沿金水大道南侧继续向西,到杜岭街北头东侧折而向南,与郑州老城西城墙内的夯土相接;而南城马路与熊耳河北侧的郑州老城南城墙内也有相同的夯土。一座规模巨大的郑州商城展现在人们面前。经发掘证实,这是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商代中期城址^⑩。

郑州商城范围很大,北城墙长约1690米,西城墙长约1870米,南城墙和东城墙均长约1700米,周长近7公里。在四周城墙上共发现十一个缺口,有些可能是城门的遗存。郑州商城是用版筑法分段分层进行夯筑的,每层夯土厚度一般为8—10厘米,也有少量夯层薄到3厘米或厚到20厘米的。在每层夯土面上,布满密集的圆形尖底或圆底的夯窝,夯窝直径多为2—4厘米,窝深1—2厘米。由于夯层薄,夯窝密,所以城墙十分坚硬。郑州商城不仅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在城内外还有丰富的遗迹。在城内中部偏北和东北部一带,有范围

很大的宫殿遗址区,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小奴隶主和平民居住区:北城墙外有一座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和一座磨制骨器的作坊遗址,西城墙外有一座烧制陶器的作坊遗址,商城南郊也有一座铸造青铜器作坊;城外还有许多农业人口居住点,如前面提到的二里岗遗址。在城东北角的白家庄附近,城东南隅的杨庄一带,以及城南的郑州烟厂和城西的北二七路、人民公园、铭功路等地方,都是比较集中的墓葬区。

在宫殿区先后发现20多处商代夯土台基,发掘三座大型房基。基中10号房基位于今东里路东段路北,现存南北长约34米,东西宽10.6米。房基是由10多层夯筑硬土堆垫而成的,在房基地坪上清理出7排用料礅石块砸成的圆形柱础或底部为坚硬平面的柱子洞,每排现存2—13个,房基西侧还保留有夯土筑成的残墙基。由于残破过甚,房基的平面结构目前还不能复原。房基内外出有一些少见的铜簪、玉簪,说明这里居住的是大奴隶主贵族。15号房基位于东里路中段南侧,东西长65米余,南北宽13.6米。房基面上有南北两排长方形的柱础槽,北面一排现存27个,南面一排东段发掘出10个,西段压在建筑物下尚未查明。大部分柱础槽中部,还保留有深灰色的木柱痕迹,木柱下都有一个石柱础,个别柱础槽上部被破坏,石柱础已经露了出来,有的是红色砂石,有的是青白色河卵石。该房基可以复原成四周为回廊,中间有九室的重檐顶大型寝殿。16号房基位于城北路中段南侧,南北长38.4米,东西宽31.2米。在房基西部和南部,发现有三排平行的圆形柱础槽,尚存52个,不少还保留有木柱痕迹和石柱础。房基中部、北部、东部均被战国文化层破坏。推测这座大型宫殿当有重檐顶,四周有宽大的回廊,也可能是“堂”一类的建筑^⑪。

商代中期,冶铸青铜器是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是各类手工业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1954年—1956年,发掘出两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⑫。一处是在郑州商城以南,即今南关外陇海马路南侧;另一处是在郑州商城以北,即今河南饭店一带。分别发掘出当时进行冶铸的操作场地——粘附有一层铜渣的硬土面,上面还有圆锥形的坑窝,可能是放置坩埚的地方。还发现有大量的坩埚残器的碎片、红烧土块、炼渣、木炭和数以千计铸造各种青铜器的陶范。其中有镞、铲、斧、刀、凿、锥等工具范;铍、戈

等兵器范,方鼎、圆鼎、鬲、甗、爵、觚、尊、罍等容器范。商代用陶范这种“硬范”来铸造青铜器,是一种先进的技术。两处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显示了郑州商城的特殊地位。在郑州商城内外的二里岗、杨庄、白家庄、东里路、铭功路、张寨南街、北二七路、人民公园和南关熊耳河等许多地方,出土了一大批商代中期青铜器。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外张寨南街出土的两件大型铜方鼎,通高分别为1米和0.87米^⑦;1982年7月,在郑州商城东南角外侧出土的两件大型铜方鼎和一件大型铜圆鼎,通高在0.8米左右^⑧。这些青铜重器造型浑厚,纹饰华美,气势磅礴,实为商代奴隶们的不朽杰作。

在商代,烧造陶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1955年在郑州商城西郊即今铭功路西侧,发现一处较大的商代制陶作坊遗址^⑨。在约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出14座排列有序的陶窑,出土几十件陶拍子和陶印模等制陶工具,还出有大量的陶片和烧坏的残破陶器,也有未经烧制的陶坯子。郑州商城内外出土最多的遗物就是陶器。从陶质上看有泥质的和夹砂的;从陶色上看有灰陶、红陶、黑陶和白陶;从制法上看有模制的、轮制的和手制的;从造型上看有平底器、圈底器、三足器、圈足器;从用途上看,有炊器、饮器(酒器)、盛器、生产工具、乐器和雕塑艺术品;从器形上分,炊器、饮器、盛器有鬲、鼎、甑、罐、甗、爵、杯、盃、罍、壶、簋、盆、瓮、钵、尊、瓮、澄滤器、缸、豆、器盖等;生产工具有纺轮、网坠、弹丸、拍子、印模等;乐器有陶埙等;雕塑艺术品有虎、羊、龟、鸟、鱼等;从纹饰上看有绳纹、弦纹、篮纹、方格纹、圆圈纹、附加堆纹、人字纹、云雷纹、饕餮纹、乳钉纹等,在不少大口尊口沿内,还刻有陶文符号,数量多达70多种,其中有一些和甲骨文相似。在郑州商城还发现有带釉的原始瓷器,多半是瓷尊一类。如郑州商城西城墙外商代墓内出的一件原始青瓷尊,用高岭土制成,胎骨灰白,细腻坚硬,火候很高,吸水性弱,肩部和腹部饰席纹、篮纹或其它几何纹饰,器表遍施光亮晶莹的黄绿色釉,代表了当时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⑩。

1954年,在郑州商城北城墙外,即今新华通讯社河南分社院内,发现了一座磨制骨器的作坊遗址^⑪。出土了上千件骨器的成品、半成品、骨料和废料,还有一批磨制骨器用的砺石等。骨料和

废料经过鉴定,除有牛骨、猪骨和鹿角外,半数以上竟然是人的肢骨和肋骨。1974年,在郑州商城内东北部,即今东里路1号院内的一条商代壕沟中,发现三处总数近百个人的头盖骨和很少量牛骨、猪骨堆放在一起。不少人头骨上有明显的锯痕,一般都是在眉骨和耳部上端横截锯开。这里可能是制作人头器皿的废料堆,充分暴露了商代奴隶社会的残酷。

在郑州商城,还出土一批玉璜、玉玦、玉戈、玉铲、玉璋、玉柄形器等玉器,反映了商代中期很高的制玉工艺水平。在郑州商城东北角内侧以狗为牺牲的祭祀坑内,出土了一团极薄的金箔片,展开后却是一件罕见的夔龙纹金叶,很可能是镶嵌在某种漆器上的装饰。这说明商代的奴隶们不但在冶铸青铜工艺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还掌握了黄金的冶炼技术并能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发现不少卜骨和少量卜甲,这表明占卜已经成为奴隶主贵族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只是没有发现甲骨卜辞,仅出土两片习刻字骨,一片上只有一个“出”字,另一片上有“又出”土羊乙贞从受十月”十个字^⑫。我们有理由期望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能找到甲骨文。

综上所述,郑州商城规模巨大,有雄伟的城垣和宫殿,有各类手工作坊,出土有罕见的青铜重器,俨然应是一座王都。据三方面考证郑州商城可能是仲丁所迁的颍都。第一,文献记载“颍都”的地望就在郑州地区。如《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水经注·济水条》:“济水又东迳敖山北……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清乾隆《荥泽县志》卷二:“敖山在县西南即器地,仲丁迁都于此”。《诗·小雅·车攻》说得更清楚:“东有甫草,驾言行狩。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旆设旆,搏兽于敖……”。甫草就是甫田之草,即今郑州东郊的圃田一带。把甫草和敖并列于诗内,说明敖距圃田不远,就在郑州地区。第二,从仲丁迁颍的情况看,颍都可能在郑州。商代曾多次迁都,水患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很小,多半是由于政治原因。一是内忧,《史记·殷本纪》记有:“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由于王位继承制度乱了章法,内部争权夺利,致使从仲丁到阳甲共五世九个王,频频迁都于颍、相、邢、奄四个地方。二是外患,《后汉书·东

夷传》记有：“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或畔或服”。其注引《竹书纪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蓝夷”。蓝夷是古代“东夷”族的一支，在今鲁南、苏北一带。仲丁迁都就是为了便于镇抚东方，征伐蓝夷。这样，就只能把王都自西向东迁，即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西亳，迁到郑州商城的敖都。第三，从考古发现上看，无论地层叠压、宫殿、作坊、墓葬、窑址等遗迹，还是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都介于偃师二里头早商文化和安阳殷墟晚商文化之间，而处于承上启下的商代中期的重要地位。这样，郑州商城就不可能是商代早期的亳都，只能是商代中期的敖都，1959年7月4日，郭沫若题诗《颂郑州》中也提到“郑州又是一般墟，疑本仲丁之所都”^③。

三

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横跨洹河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西起北辛庄西侧，东至郭家湾以东，北自三家庄，南到刘家庄、戚家桥一线，总面积达30平方公里。解放前，这里已发掘出宫殿基址和王陵大墓，出有一大批甲骨文和无法计数的铜器、石器、玉器、骨器和象牙器。建国以来对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又取得十分可喜的成就^④。

1950年春，在殷墟武官村北，发掘了一座大墓^⑤。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4米，东西宽12米，南墓道长15.6米，北墓道长15米。殉葬79人，动物59只，随葬有一批青铜器、玉器、白陶器和石器。其中有一件虎纹石磬，长84厘米，宽24厘米，悬挂敲击，其音悠扬清越，近于铜声。在大墓南侧，还有一批惨绝人寰的人祭坑。1950年发掘26座，坑内被屠杀的奴隶达209人；1959年又发掘10座；1976年发现250座，发掘了其中的181座，有人骨架969具。多为青壮年男性，也有一些女性遗骨，甚至有一些儿童和幼儿。这可能是商王室用于祭祀王陵内的死者及其祖先的场所^⑥。

1976年，在小屯村北略偏西约100米处，发掘出有名的“妇好”墓。墓内殉葬16个奴隶和8只狗。随葬铜器468件，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象牙器5件，陶器11件，蚌器15件。此外，还有红螺2件，阿拉伯绶贝

1件，以及海贝6820多个。这些随葬品或铸造精美，或雕刻工细，富丽华贵，独具匠心，组成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青铜器中多有“妇好”等铭文，这当是墓主人。妇好是武丁的配偶，甲骨文多有记载。她生前有相当大的军事统率权，墓内出土铸有“妇好”铭文的大铜钺就是佐证。她带兵西攻羌方，北打土方，南征巴方，东伐夷方，武丁时的名将沚戠、侯告等均在其麾下。甲骨文记有“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一次伐羌用兵达一万三千人，可见战争规模之大。在商代，祭祀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往往是商王本人亲自主持的。有时，商王也命令他的亲信、重臣代为主祭，妇好就曾代武丁主持过一系列的多种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既领兵打仗，又主持祭祀，可见其地位重要，声势显赫。妇好墓保存完好，是唯一一座能与文献联系推定墓主的商代王室墓葬。对研究商代历史，尤其是武丁时期的社会经济、手工业、方国、文化艺术、礼制、以及铜器断代和殷墟布局等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⑦。

1969年—1977年，在殷墟西区近3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出939座小型墓葬，死者绝多是殷代社会的平民。有规律地分布在8个墓区内。各个墓区之间有一定的界限，各个墓区的墓葬在埋葬习俗、随葬陶器组合及铜器铭文等方面，都各具有一定的特征。一个墓区就是一个族的墓地。一些先秦史料和甲骨文都记载有殷代社会中还保留着原始社会所残留的族的组织形式，殷人在从事生产活动或军事活动时，往往是以族为单位进行的。他们生时聚族而居，合族而动，死后同族而葬。这些分区的平民墓，从考古资料上提供了例证^⑧。

在小屯西3公里的北辛庄南地，发现了一座制骨作坊遗址，出土有铜刀、铜锯、铜钻和砺石等制作骨器的工具，以及骨笄、骨锥等骨器，还有骨料和半成品等，总计达5000多件。在大司空村南地，也发现有类似规模的制骨作坊遗址。在小屯东南1公里的苗圃北地，发现一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铸铜作坊遗址，出土有直径1米的炼炉和直径0.83米的大型坩埚，还出有一大批铸造各种礼器和兵器的陶范，其中包括长达1.2米的方形大陶范。可以看出铸铜作坊的规模有多么巨大。在薛家庄南地和孝民屯西地，也分别发现有铸铜遗址。

1975年冬，在小屯村北约40米处，发掘出商

代房基,出土有一块长22厘米,宽13厘米,厚7厘米涂有白灰面的墙皮,上面绘有红色花纹和黑色圆点,线条较粗,转角圆钝,组成对称的图案。表明在商代晚期的建筑物上已发现了壁画,比咸阳市的秦壁画提早了八百年,它又一次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艺术成就^⑧。

甲骨文是商代考古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解放前曾发掘出数万片甲骨文。建国后多次又发现甲骨文。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5041片^⑨。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有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等。尤其难得的是,这批甲骨文绝大多数都有可靠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这对甲骨文的分期研究,是很有科学价值的。

在殷墟尚未发现像郑州商城那样的城垣,但作为一座王都不可能没有防御设施。在小屯村西地发现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北端通向洹河南岸,向南伸向花园庄西南地,然后东折,直达洹河西岸。沟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长约650米,沟宽7—21米,深5—10米。环绕在宗庙宫殿区的西、南两面,为人工挖成的防御设施。而北、东两面为洹河流过,可为天然防护屏障。也许在小屯村附近根本就没有城墙,距小屯较远的地方可能有城墙,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

四

除了上述三座商代王都之外,在河南全省还发现有商代遗址达二百余处。如郑州上街^⑩、岔河、荥阳西史村、张片庄,新郑贾庄和望京楼,中牟黄店、大庄^⑪,密县曲梁、新砦,登封袁桥,巩县稍柴,尉氏南曹,杞县陆台岗、竹林,洛阳东干沟、马沟、胙李、东关泰山庙,偃师灰嘴,新安南岗,洛宁坡头,伊川白元,临汝夏店^⑫、李楼、煤山,郟县太仆,淇县鲍屯、摘心台,浚县大赉店,焦作南朱村、府城,武陟大驾、龙睡村、商村、赵庄、修武李固,温县小南张、北平皋,安阳大寒,汤阴羑里城,内黄刘茨范,林县下庄、下陶,新乡潞王坟^⑬,获嘉照镜、东张居、同盟山,辉县褚丘、琉璃阁、孟庄、凤头岗,原阳谷堆,陕县七里铺^⑭,渑池鹿寺^⑮,灵宝东桥、王家湾、赵家沟,许昌大路陈,鄢陵三里侯冢,禹县

瓦店,长葛苗庄,郾城拦河潘,舞阳北舞渡和吴城北高,柘城孟庄^⑯,睢县周龙岗、乔寨,民权李岗,夏邑蔡楼,虞城魏固堆,项城毛冢,西华界台寺、陆城、胡寨,郸城汲冢,鹿邑栾台、太清宫,太康方城、陶母岗,驻马店郭楼,泌阳太子岭,罗山后李(天湖),固始平寨,南阳十里庙^⑰,内乡黄龙岗等许多地方。发现有商代的文化层和房基、窖穴、墓葬,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其它的一些遗物。其中不少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1968年8月,在温县小南张村的一座商代墓内,出土23件青铜器。包括方鼎、甗、簋、罍、爵、觚等容器,编铙等乐器,戈、镞、削等兵器和工具。多数质地厚重,造型大方,纹饰精美。其中一件罍,腹周壁铸有三个扉棱,其间饰三组直立展翅的鸱纹,颇为罕见^⑱。不少铜器上还铸有“徙”字铭文。“徙”字与甲骨文的“𠂔”字相同。甲骨文中有“令犬𠂔氏新射”,“令犬𠂔田于京”,“勿令犬𠂔田于京”等记载,看来这与狩猎是有关的。温县在商代是属于王室贵族田猎区范围之内。“𠂔”可能是氏族名称,“犬”可能是商代的狩猎官名。推测墓主人是一个负责狩猎的小官。

1979年—1985年,在罗山县后李村连续三次发掘20余座商代墓葬,均系长方竖穴土坑墓。形制较大,如1号墓长6.5米,宽3.8米;6号墓长5米,宽2.83米。大部分都是木椁墓,方向都是头朝北。头厢附近随葬有青铜礼器,棺内中部随葬玉器和兵器。棺底都铺有厚约2厘米的朱砂。大部分墓底中部都有腰坑。棺椁间有殉人、殉马腿、牛腿的迹象,腰坑内都殉有狗。8号墓除椁顶上殉葬有两个奴隶之外,在墓坑填土中还发现两具上下叠压的殉葬奴隶薄板棺。墓主的棺椁都髹黑漆,有的内红外黑,有的棺板上雕刻有夔龙纹和云雷纹装饰。

后李商代墓地随葬品相当丰富,除一批陶器、玉器、石器和木漆器之外,还有200多件青铜器。其中有鼎、甗、鬯、尊、卣、觥、爵、罍、斗、勺、铃等青铜容器,还有斧、刀、钺、削、铍、铲、凿、锥等生产工具;也有钺、戈、矛、镞等兵器,又有一些车马器等。这批青铜器大多保存完好,有的甚至很少锈蚀。其中一件鸱鸢卣,器身椭圆形,像两只背靠背的鸱鸢。提梁两端饰象首纹,盖顶有一蘑菇状圆柱。盖上饰两组饕餮纹,鼻部突出。卣的主题花纹为鸱的两翼,腹部饰卷尾和四条夔龙,中有扉棱。

下腹还有四只小鸟。器底有一龟纹。四足中空,外饰夔龙。全部图案都以云雷纹衬地。是这批商代铜器中最精湛的一件。令人惊叹的是,46号墓出土的铜卣内存有液体,经鉴定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酒。不少青铜器还铸有铭文,其中27件铸有“息”字,为一种族徽文字。安阳殷墟有一块骨白刻辞记有:“戊申妇息示二屯永”。“妇息”即息族之女嫁给商王者。据此推之,罗山后李商代墓地应是商代息国的贵族墓地^⑥。

罗山后李墓地,是近年来商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甚至有的学者把这里称之为“小殷墟”。这里介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南部边缘地带。向北跨过淮河,即进入商王朝的中心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南通过大隧关穿越大别山脉,可达两湖平原。这样,息国作为商代南方的重要与国和中原商王朝保持着密切关系,甚至还与商王室通婚;同时也与长江流域诸方国部族有着一定的联系。在其文化特征上,基本与中原商王朝文化相一致,但又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用青膏泥涂抹墓壁,用石铲随葬,还出土有较特殊的凹字形铜钺、木援铜内戈、漆木器和几何纹硬陶等,都不见或少见于中原地区,而与南方地区文化有相似之处。这种现象表明,息国所存的今河南省东南部,应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相互交汇融合的地区之一,这种交汇融合的文化对研究商文化的地域类型有重要价值。

建国以来河南的商代考古新发现,为商文化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料,发表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郑州二里岗》、《殷墟发掘报告》、《殷墟妇好墓》、《辉县发掘报告》等一批考古专刊;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殷墟玉器》、《郑州商城初探》、《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等十余种学术专著;发表了几百多篇有关河南商代的考古报告、简报和学术论文。在台湾和海外的学者,也出版了一批有关河南商代考古研究的专刊、专著和文章。1983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郑州召开。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夏文化探索,商文化研究和青铜器;1984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发起的全国商史讨论会在安阳召开,会上对商代考古的发现,尤其是关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1987年9月,中国殷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召开,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名专家参加,对殷商考古学

和甲骨学等方面,进行了学术交流;1988年10月,为纪念殷墟发掘六十周年,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在安阳召开座谈会^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⑧。与会者论述60年来尤其是建国以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并怀念现在台湾的当年曾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界前辈,呼吁早日实现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推动殷墟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今年,既是建国四十周年,又是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九十周年,9月中旬,在安阳召开由国内外学者参加的学术纪念活动。回顾过去的商代考古发现和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期望取得更大成就。

注:

-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
- ②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
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4期。
- ④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2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4期。
-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3期。
- ⑦ 《我国发现商代前期城址》,《光明日报》1984年2月23日。
《偃师发掘出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人民日报》1984年3月4日。
《偃师尸乡沟发现商代早期都城遗址》,《考古》1984年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6期。
-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
-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2期。
- ⑩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考古》1984年10期。
- ⑫ 安志敏:《1952年秋郑州二里岗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八册。
- ⑬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

- ⑭ 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1集1977年。
- ⑮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城内宫殿遗址区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83年4期。
- ⑯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廖永民:《郑州市发现的一处商代居住与铸造铜器遗址简介》,《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6期。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 ⑰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6期。
- ⑱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年3期。
- ⑲ 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8期。
- ⑳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考古》1965年10期。
- ㉑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 ㉒ 安金槐:《一年来郑州市的文物调查发掘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
- 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5期。
-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 ㉓ 郭沫若:《豫秦晋访古十八首》,《文物》1959年8期。
- 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年10期。
- ㉕ 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 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
- 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2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

社1980年版。

- 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2期。
- ㉙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4期。
- ㉚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1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册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
- ㉛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郑州上街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1期。
- ㉜ 赵新来:《中牟黄店、大庄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0年12期。
- ㉝ 倪自励:《临汝夏店发现商代文化遗址》,《文物》1961年1期。
- ㉞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路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1期。
- ㉟ 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年1期。
- ㊱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浉池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年9期。
- 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1期。
- ㊳ 游清汉:《河南南阳市十里庙发现商代遗址》,《考古》1959年7期。
- ㊴ 杨宝顺:《温县出土的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2期。
- ㊵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2期。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4期。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1期。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2期。
- ㊶ 聂玉海:《纪念殷墟科学发掘六十周年座谈会在安阳举行》,《中原文物》1988年4期。
- ㊷ 柳明:《纪念殷墟发掘六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考古》1988年12期。

中原文物 1989年3期

四十年来河南商代考古的成就

陈 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四十年来,是河南商代考古的“黄金时代”。这四十年,河南商代考古工作有长足的进展,不仅在田野调查发掘方面获得了重要发现,而且在研究方面也不断深入,成果累累。

四十年来,河南商代考古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是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发现,及殷墟发掘所取得的新收获。

郑州商城是五十年代中期发现的。五十年代初,在郑州二里冈首次发现商代陶片,经过对二里冈遗址的发掘之后,开始了解到这个遗址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其文化面貌与安阳殷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不同于殷墟文化的商代文化,称为“二里冈文化”。其后在郑州人民公园发现的商代文化堆积层位证明,二里冈文化的年代早于殷墟文化,从此确立了二里冈文化的历史地位。

二里冈文化的发现,拉开了商代前期历史文化的帷幕。经调查,在郑州市区 2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都分布有二里冈文化遗存;表明商代前期文化在郑州地区有着丰富的遗存。1955 年,在白家庄遗址,又发现二里冈文化层下叠压着夯土建筑遗迹,经过勘查钻探,弄清了夯土建筑是商代的城垣墙,由此又认识到郑州商代遗址是一处商代前期城址,郑州商城由此被揭示出来。

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已经了解到郑州商城

的建筑规模宏伟,面积宽广,文化内涵丰富。

城址座落在商代遗址的中心区,周长近 7 公里,总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在城址的东北部发现有大量夯土台基,台基上还发现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估计这一带是宫阙区。在西城墙外的张寨南街,和城东南角的二里冈则发现有窖藏青铜器,出一批精美铜器,其中有四件大铜方鼎应是王室重器。在紫荆山北和南关外,则分别发现有铸铜作坊遗址,出有大量铸铜陶范。紫荆山北和铭功路还发现有制骨作坊和制陶作坊遗址。在白家庄等地,还发现有不少奴隶主贵族墓。在城址内外还挖出有成批的青铜器、部分玉器、原始瓷器以及一些刻字甲骨;这些重要遗迹和遗物的发现,充分说明郑州商城应该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重要都邑遗址^①。

郑州商城的发现,是继殷墟的发现之后又一重要收获,这是考古学上第一次找到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因此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而二里冈文化的发现,则填补了我国商代前期文化的空白,并且以此为契机发现郑州商城,所以,二里冈文化和郑州商城的发现,就成为建国以后河南商代考古最重要的收获。

偃师商城发现于 1983 年^②。它位于偃师县城西郊,北倚邙山,南临洛河,向西南约 6 公里与二里头遗址隔河相望。城址中部有一条“尸乡沟”横穿而过。

城址呈不规则的纵长方形,现存北、东、西三面城墙,南城墙不见,可能已被洛河冲毁。城墙周长 5400 米,城址面积约 190 万平方米。在三面城墙上已探出七座城门,北城门一座,东、西城门各三座。

在城址内已发现三座方形小城,居中的一座面积最大,约4万平方米,四周环绕有宫城,南面正中有门道。在宫城内已挖出两处夯土建筑群,其中一处是由殿堂、廊庑、庭院、大门和西侧门组成的一组布局有序的宫殿建筑。另一处宫殿基址呈长方形,北面是正殿,正殿两侧和东西各有庑址。其余两座小城内,发现有排房式建筑,发掘者估计可能是库房或营房。

在城址内还发现有11条宽阔的道路,纵横交错与城门方位相对应。在西城门以南还探出一条“马道”。此外,在城址内还挖出有墓葬、窖穴、水井和石结构的排水设施等遗迹,并出土有一批石器、陶器和部分青铜器。这些主要遗迹和青铜器的发现,表明这个遗址的性质应是一座商代城址^③。

偃师商城的重要性有二点,一是它的年代较早。从出土的遗物看,城址的年代属二里冈期文化。二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据文献记载,在偃师以西的尸乡一带,是汤都亳的所在地,因此,这座城址的地望与文献上所说的亳都位置相合,由此而引起人们的重视,亦被认为是商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殷墟遗址是以甲骨文的发现为契机发现的商代晚期都邑遗址。由于在甲骨卜辞中释出受祭的帝王有康丁、武祖乙、文祖丁之称,因此被确定为盘庚迁殷的殷都。

解放前,殷墟的发掘工作即已展开,并挖掘出有宫殿基址、陵墓以及大批青铜器、甲骨文等重要遗迹遗物。新中国建立后的四十年,殷墟的发掘持续不断,先后又发现有王陵及其配偶墓、祭祀坑、族墓地、手工业作坊遗址等重要遗迹,并获得大批青铜器、玉器、甲骨卜辞等珍贵遗物。

1950年初,在武官村发掘出大墓和一批人殉坑,推动了人殉人祭的研究和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七十年代发现的妇好墓^④,获得青铜器460多件,其中礼器210件,玉器755件,还有宝石制品和象牙器等珍品,青铜器多有铭文,凡九种,最多的是妇好之铭。妇好之名,古甲骨卜辞中屡见,是殷王武丁的配偶,因此,妇好墓的发现,是殷墟第一次发现与甲骨相印证,以判断墓主和年代的殷代王室墓。由于这座墓保存完好,而且有铭文判断年代,对研究殷代王室的葬制及陵墓的分期也有重要意义。1978年,在王陵西区还发现一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AHBM₁)^⑤,此墓被M1217大墓所

打破,这是殷墟发掘的大墓中仅见有地层关系的两座,它不仅解决了这两座大墓的年代关系,而且还为大墓的分期提供了地层依据。

殷墟发现的祭祀坑已有多处。在后岗发现的一个圆形祭祀坑^⑥,内埋有不少的人头和被砍去头颅的人骨架,约有70余个个体,出有一件铜鼎,铸铭30余字,内有“戊嗣子鼎”铭,这是殷墟出土的铜器中铸铭最多的一件,对研究商代青铜器铭文的发展有其重要价值。在王陵还发现一批祭祀坑,其中东区的祭祀坑埋有许多人骨、南北向祭祀坑埋砍头的青壮年男性,东西向祭祀坑埋全躯女性^⑦。西区祭祀坑则埋有兽骨,以马为多,余为象、牛、猪、狗、猴之类动物,这对研究商代的祭祀活动具有重要价值。

族墓地在大司空村、苗圃北地、后岗、殷墟西区、戚家庄、刘家庄等地都有发现,其中以殷墟西区的墓地规模最大,已挖掘出墓939座^⑧。这个墓地的特点是墓的分布成片集中,所埋死者,有不同的身份地位,有奴隶主贵族,也有平民,是研究商代“族”葬制的重要资料。

手工业作坊遗址在苗圃北地、薛家庄、孝民屯分别发现铸铜遗址。在孝民屯还发现制骨遗址,在小屯则发现有制玉石遗址。这些作坊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商代后期手工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小屯宫殿区以西还发现一条大壕沟,环绕宫殿宗庙区的西、南两面,东北两端与洹水相接,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长约650米。它可能是人工开挖的一条防御设施,和洹水结合形成一道保卫屏障^⑨。

四十年来,殷墟发掘出的大批青铜器、甲骨卜辞,对研究商代文明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价值。其中,1973年在小屯南地挖出的5千余片刻字甲骨,不仅增添了丰富的文字资料,而且这批甲骨有明确的出土地层,根据地层证实过去出土的“自组卜辞”属武丁时期,为甲骨文的分期提供了地层根据^⑩。

殷墟遗址经过四十年的发掘,不仅发现许多重要遗迹,获得大批重要而珍贵的文物,而且基本上弄清了殷墟的布局 and 范围,揭示出了这座古老都城的面貌,拓展了商史的研究和展示高度发展的商代文明。

四十年的河南商代考古,除上述收获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发现。

1979年,在罗山后李发现一外商代墓地,挖出商墓17座^⑮,每墓均随葬有青铜器,有的还有殉人。据出土的铜器判断,墓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2—4期。在7座墓出土的23件铜器中,都铸有相同的族徽,有人释之为“息”字,由此被认为是地方诸侯息国的家族墓地^⑯。此处墓地正处于商代王朝通往南方方国的要道,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它的发现对研究商代中原与南方的交往关系十分重要。

此外,与商代考古相关的是在豫东发现岳石文化和在豫北发现先商文化。

豫东岳石文化是近年发现的。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1960年首次在山东平度县岳石遗址发现,七十年代以后,此类文化在山东各地已有不少发现,因而加深了对这一文化的认识被确定为岳石文化,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夏商文化,文化面貌与中原夏商文化不同,而分布地域则与文献所记载的夷人活动范围相一致,因此被认为是夷人文化。1987年和1988年,在豫东的鹿邑柰台^⑰和夏邑县清凉山遗址^⑱,均发现有岳石文化层,说明豫东地区也是岳石文化分范地域。这一发现,不仅以考古学文化上否定了商文化的东来说,而且汤都南亳说,也失去根据。

在豫北地区,则发现一种与偃师二里头文化晚期年代相当,而文化面貌又具有自身特点的一种类型文化遗存,这种遗存,以1958年在新乡发掘的潞王坟遗址为代表^⑲。有的学者认为它属于先商文化,因此,它的发现,不仅找到了郑州早商文化的来源,而且对识别和区分夏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四十年来河南商代考古所取得的许多重要发现,已积累起大批难得的实物资料,推进了商代历史的研究和夏文化的探索,使我国夏商文化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二

四十年来,河南商代考古在获得大批发掘资料的同时,也对商代文化遗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涉及的问题广泛,其中最基本的是文化分期研究。

商代文化分期,主要以郑州和殷墟遗存为基

础。

郑州商代文化的分期从五十年代开始。1956年,邹衡先生发表了《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⑳一文,首次谈到郑州商代文化分期,他根据二里冈和人民公园两个遗址发掘的地层关系及陶器特征的变化,将郑州商代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同时也将小屯殷墟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并将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序列如下:

郑州商代早期→郑州商代中期→

小屯早期^{郑州晚期}小屯晚期
小屯中期

这一分期,不但明确了郑州商代文化本身的发展,而且还解决了郑州商代文化年代早于小屯殷墟文化早期,确定了郑州商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1957年,《郑州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发表,初步公布了1955年以前的发掘资料,也谈到了文化分期。它将郑州商代文化分为二里冈期和人民公园期两期,其中二里冈期又根据文化堆积层次分上下两层,同时把南关外、白家庄、铭功路、紫荆山北等遗址的商代遗存,分别归属于二里冈下层和上层。1959年,《二里冈》发掘报告出版,把二里冈上下层出土的陶器标本作了分类排比,并根据地层和上下层陶器特征的不同,及其演变规律,认为二里冈下层和上层代表早、晚两个不同时期的遗存,从而树立了二里冈陶器分期和年代早晚的标尺。

八十年代初,由于郑州商代文化的发掘资料日益丰富,尤其是白家庄和南关外遗址的发掘资料亦分别发表;而且这两个遗址又区分出有别于二里冈期的堆积层次,因而也就有必要和可能对郑州商代文化作进一步的分期。

1980年,邹衡先生在探索夏文化过程中,把商文化重新作了系统的分期,他根据典型地层和陶器、铜器特征的演变,将整个商文化分为三期七段14组^㉑,属郑州商文化范围的共两期四段6组,即先商期第一段Ⅰ组至早商期第四段第Ⅳ组,各期、段、组的代表单位都作了明确的标定。新的分期不仅比以前的分期细致,而且还将以前分期所依据的地层作了部分调整。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将南关外遗址的地层进行了调整合并。南关外遗存,发掘报告分上、中、下三层,在新的分期中,他把中下两层合并为一层,根据是原分中下两层的地层关系是一条壕沟,其文化堆积虽有两